

佟玉华 李瑛 著

中国社会发展 启示录



序　　言

百年前，被鸦片战争惊醒的中华民族，在迷迷茫茫中被迫接受发源于西方的现代文明挑战。拿破仑曾说：中国是一条沉睡雄狮，一旦醒来，将震撼世界。中国这条沉睡数百年的雄狮已被惊醒，一经醒来，睁开被长城和兵马俑困扰锁住的双眼，放眼环视世界，惶然发现自己睡的太久太久，奋然迈开被羁绊重重的双腿，却步履维艰，总能听见古老石器和金属相碰撞的声响。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到试图建立君主立宪的维新运动；从以“武器的批判”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到打倒“孔家店”请进德先生赛先生的新文化运动；从试图统一中国的北伐革命，到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 50 年代末赶英超美的大跃进，到 70 年代末的改革开放重新启动现代化，中华民族多少优秀儿女，多少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地探索振兴中华之路。然而，这仍然是个未圆的百年富民强国梦。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现代，中国依然不发达，至今现代化之路仍然是困难重重，关隘林立。因而，从理论上从实践中探索中国社会发展之路，中华民族强盛之旅，成为每一个关心祖国前途和命运的中国人思考的焦点。人们向历史追问，向现实求索，试图探取普罗米修斯之火，以使中华巨龙重新腾飞于九霄之上，跻身于世界民族强林之列。

今天，在人类社会即将迈入新世纪的时刻，中国社会发展也处于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这就是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摆脱贫穷的关键时期、实现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社会改革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历史性的关键时期，我们既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和大好机遇，也面对着世界范围内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的严峻挑战及我们自身发展难题的严峻挑战。这需要我们摆脱任何犹豫，大胆探索，澄清种种

疑惑，开拓奋进，迎接挑战，牢牢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把中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

然而，社会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也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巨大难题。社会发展是社会各领域各层面系统演进协同进步的历史过程。中国社会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而是包含着复杂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中国近代由于数症并发：政治衰败、文化危机、社会整合紊乱、社会结构失序……，导致社会发展衰退。今天，中国社会发展仍然面临着诸多相互交错的问题：权威流失、腐败蔓延、价值真空、道德失范、生态失衡、人口爆炸、失业增多、贫富拉大等等。因而，无论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和现实审视，还是从世界各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经验出发；无论是从我们面对着富有挑战的千变万化的未来角度察看，还是从世界历史发展高度的视角观之，都迫切需要我们从社会整体角度，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相互作用、相互关联角度，全新地构建和整合我们社会发展的力量和机制，选择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发展战略。

本书试图全方位、多视角地对中国社会发展问题加以研究和探讨，从历史发展回音中思索中国现实发展之路，从中国现实发展状况中寻找通向未来的理性桥梁，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体制、生态等等多层次交错联系中探讨中国社会发展的力量、机制和发展战略，从而尽作者之薄力，借拙陋之作以引玉，使读者在一目十行后，对中国社会发展这一博大精深的课题，得出更加符合实际和逻辑的结论。

佟玉华

1998 年 3 月

目 录

上部 社会发展的历史回音与思索

曾经辉煌过——那是祖先的荣耀.....	(3)
悠久辉煌的华夏文明.....	(3)
华夏文明的顿挫沉浮.....	(5)
步履艰难的跋涉——中国文明衰落探源.....	(7)
近代中国对西方文明挑战的回应.....	(7)
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衰微机理	(12)
历史的抉择——现实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	(17)
艰难而必然的选择	(17)
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	(19)
现实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特点	(23)

中部 社会发展力量和机制的整合与构建

后发型现代化启动和发展的杠杆——强力政府系统	(29)
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启动的先决条件	(29)

经济社会发展的强烈要求	(33)
政治体制改革的模式选择与改革的维度	(40)
走出中国历史发展周期率的必然选择——依法治国	(47)
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	(47)
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必经之路	(50)
法制现代化的难点和阻滞因素	(59)
依法治国的实现方略	(62)
经济社会发展的内隐力量——重塑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	(68)
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力	(68)
现代商品经济的文化价值原则	(76)
创造开放兼容的文化系统	(80)
社会发展的永动机——构架合理的利益机制	(87)
人类历史活动的杠杆与驱动力	(87)
合理利益运行机制的构建	(93)
社会发展的外部机制——全方位对外开放	(105)
历史向世界性历史转变	(105)
中国富民强国的必由之路	(110)
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对外开放	(112)
社会现代化的先导与核心——人的现代化	(118)
人是社会发展之本	(118)
人的现代化的滞后与表现	(120)
塑造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人	(124)

下部 社会发展战略模式与选择

中国社会发展可资选择的模式——可持续发展之路	(133)
-------------------------------	-------	-------

现实与未来的主题	(133)
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定位	(142)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境与危机	(146)
生存与发展的出路	(161)
赢得未来的金钥匙——教育优先发展	(173)
中国社会文明的曙光	(173)
中国教育现状与问题	(175)
中国教育发展的基本思路	(185)
立国强国的捷径——科技超前发展	(203)
中国靠什么赢得 21 世纪	(203)
现代世界科技发展的基本态势	(204)
对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内涵的再认识	(209)
中国科技发展的现状与问题	(213)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基本构想	(216)
超大型国家发展的基础——人口优化再生产	(227)
人口问题的忧与患	(227)
从人口困境到发展困境	(239)
人口大国的希望	(246)

上 部

社会发展的历史回音与思索

曾经辉煌过——那是祖先的荣耀

悠久辉煌的华夏文明

古老壮观的长城，宏伟的故宫，气势磅礴的兵马俑，浩繁的典籍，都在述说古老的中华大地曾有过繁荣与富强。放眼世界就会发现，东方文明是最早出现在人类地平线上的古老文明之一，中国是它的发源地和核心。

古代中华民族改造自然的气魄，令世界赞叹不已。当西方尚处在茹毛饮血的时代，中国已经有了水稻小麦培育和播种技术。在世界 666 种栽培作物中有 136 种是中国人民培育成功的。人们利用江河湖泊、地面水、井泉、地下水以及降雨降雪，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兴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设施，其中，既有储水的塘、堰，又有防水的堤、坝，排水的沟、渠。都江堰等大型水利工程，仍然为当今世界水利灌溉工程的奇迹。而先进冶炼技术使我国在铁生产方面独领风骚数千年，使我国古代生产力得以快速发展。王德胜、董晨在 1992 年 10 月 6 日《中国教育报》发表的《中华古代科技与日月同辉》一文指出：“战国中晚期（约公元前 3 至 2 世纪），粮食亩产已超过 100 公斤，西汉末年（约公元前 1 世纪）130 多公斤，唐代（公元 618 至 907 年）达到 160 多公斤，宋代全盛时全国粮食总产估计为 464 亿斤，而 11 世纪的西方各国总共不过 210 亿斤。”17 世纪，俄罗斯铁产量在西方各国中最多，只不过 2400 吨，而我国宋代治平年间（1064—1067），铁产量已达到 4100 多吨，到了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年铁产量高达 9700 吨。

我们祖先在长期与疾病斗争中，创造了辉煌的中医治疗经验和理论。《黄帝内经》、《神农本草》、《金匮要略》等经典名著成为人

类医学宝库的精华。晋代葛洪在他的著作中有关恙虫病的记载，比美国医生帕姆于 1878 年的记载早 1000 多年。宋代钱乙撰《小儿药证直诀》为世界现有最早的儿科专著。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更是无人不晓。

对资本主义到来产生巨大影响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更是辉煌灿烂。而欧洲人正是靠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完成了文艺复兴、宗教革命，靠指南针完成了环球航行并发现了美洲新大陆，靠火药实现了资产阶级对封建主革命的胜利。马克思曾经这样赞誉四大发明，他在《经济学手稿》中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新教工具，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精神发展到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专门研究中国古代科技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惊叹：中国的“发明和发现往往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 15 世纪以前更是如此。”的确，中华民族创造出众多的“世界第一”。除了四大发明，在天文学方面，我们拥有 4000 多年星象记载的天文学史，有公元前 28 年最早关于太阳黑子的记录；唐代名僧一行第一个测量了地球的子午线；而元代郭守敬计算的一年时间仅比现代公历差 26 秒，时间却早 300 年；3000 多年前的商高发现了勾股定理；祖冲之的圆周率在精确度上保持了近千年的领先地位；华佗最早应用全身麻醉；沈括对磁偏角的发现成为世界地理科学史上的重大成果，领先于欧洲 400 多年；公元前 2 世纪天平式温度计测仪比欧洲早 1600 年；2000 年前的《汜胜之书》提出了世界上最早的遗传、育种学；公元 9 世纪的西夏铜炮，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公元 11 世纪出现于北宋的钻探技术比欧美早 800 年。……

源远流长而又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更是显示了中华民族非凡的情感智慧和文学造诣。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和国家，有过中国这样流长久远

而又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遗产；洋洋大观的二十五史，记载着雄汉盛唐“君临天下”般气势非凡的强盛与繁荣；文学上从《诗经》到《红楼梦》，显示出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学造诣之深、审美情趣之高；哲学上，老子《道德经》微奥精深、丰富博大；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学说，更是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反映了中华民族注重现世，注重现实中的伦理人际关系的心态。

正如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感叹：“历史之所以使中国人执迷其中，正因为历史中有着丰富的东西。”的确，中国的历史文化太丰富了。在此不厌其烦地罗列这些只想向世人说明，近代以前中国确实是世界文明的骄子，中华民族曾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

华夏文明的顿挫沉浮

然而，也正因为中国历史文化太丰富，使国人沉醉执迷其中，自傲、自大、自足吞蚀了人们的进取、求新、创造精神，即中国人创造了辉煌的文化，又被这种文化之茧所缚。故此，使中国社会发展逐渐趋缓，到18世纪已基本停滞。此时，西方文明在迅速赶超东方文明，但中国由于自我中心意识所形成的麻木和迟钝，感受不到发源于西方而以强劲之势席卷世界的现代文明，仍旧陶醉在2000多年文明所带来的繁荣之中，顽固地坚持着中国即是天下，四周皆是蛮夷。然而，辉煌了2000年之久的东方文明在迅速崛起的西方文明强力挑战下却轰然坍崩，并出现空前危机，社会发展顿挫。时至今日，中国仍然是发展中的国家，尚在追赶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潮。

今天，当我们再回眸中华古国辉煌成就时，应有清醒的认识，不应有丝毫的骄傲和荣耀，因这些辉煌文明是我们祖先之创造、祖先之智慧、祖先之荣耀、祖先之骄傲。我们不应该再是鲁迅笔下的人物——阿Q式的自我陶醉，总是念念不忘我们祖上有啥，躺在

祖先的功劳簿上，发古之幽情，思古之辉煌，念古代圣贤经典之伟大。我们不应再陶醉于这些成果，应清醒自问我们为祖先的功劳簿上增添了什么成就和辉煌？电灯、电话、火车、轮船、冰箱、彩电、飞机、大炮、电脑、传真机……这些近现代的科技成果哪一项是国人的发明和创造？难道我们总是向后代津津乐道古代的四大发明来增加吾国的自豪和荣誉？而事实却是在即将迈向 21 世纪的此刻，如果问到日本有什么，被问者会回答：丰田、松下、三菱等等。问美国有什么，被问者会回答：可口可乐、万宝路、IBM、卡迪拉克等等。问德国有什么，被问者会回答：奔驰、宝马、西门子。问中国有什么，被问者会回答：长城、故宫、兵马俑，问到产品，最多知道丝绸和茶叶。这是执迷陶醉的结果，今天我们应该能体会这种悲哀，应该能够体会什么叫“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已经脆弱到这种程度，谈到西方文化的缺陷，就自傲的认为讲求天人合一的儒家文化能拯救人类于失衡文明之中；尽管我们的足球落后，但足球发源于中国宋朝；喇叭裤发明于中国唐朝；连比萨饼的发明也是马可·波罗到中国时由中国的馅饼受到的启发，但是，马可·波罗最终忘了中国人用什么办法把肉馅包进饼里，干脆就把馅放在外面。可是，无论怎样我们也躲不过“祖上曾经富过”的落破感觉。的确，近代以来我们并没给祖先的功劳簿上增添什么引以骄傲和自豪的发明创造，相反，中国社会发展却是一步步落伍。因而，应从历史的辉煌中首先感受到的是沉重的历史责任，增强的是浓重的忧患意识，而不是骄傲和荣誉。

那么，为什么一个万邦来朝的大国在西方强力挑战面前分崩离析？为什么聚集了 2000 年之久的东方文明在与近代崛起的西方文明碰撞中崩塌顿挫？为什么曾经发展位于世界前列的中华民族至今仍处于不发达之列？这样我们就要深邃历史的内部，探测文明古国近现代落伍的原因和发展的障碍机理。

步履艰难的跋涉——中国文明衰落探源

近代中国对西方文明挑战的回应

近代，当中国的统治阶级仍旧陶醉在“天朝德威远被，万邦来朝，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的狭隘观念之时，西方文明正在迅速赶超东方文明，并使辉煌了 2000 年之久的东方文明，在西方船坚炮利面前轰然坍崩，倾刻之间就遭到了灭顶之灾。

1840 年，小视天下的中华帝国竟受到一个小小蛮夷的挑战，在只有数十条军舰总共不到一万人面前，犹如蚁穴溃堤，毫无阻挡之力。英军占香港、攻广州、下镇江、直逼北京门户，简直如入无人之境。这场战争，惊醒执迷沉睡在 2000 多年文明所带来的繁荣之中的国人，迷迷茫茫中被迫迎接西方的双重挑战：既要反对西方的入侵，又要向它们学习，富民强国。至此，拉开了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冲突碰撞的序幕。从此，中国也跌入恶梦连连、鬼魅丛生的百年，这也是中华民族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奔走呼号，图强独立的百年探索史。

洋务运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1840 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人从失败的震惊中醒来，痛定思痛，开始寻找失败的原因。较明智的上层人物归咎于器物上的失败，即大刀长矛对洋枪洋炮的失败。因而，师夷主要是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能制造并掌握洋枪洋炮，以御敌于域外。其代表人物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清朝上层统治者在这个问题上，目标也是一致的。1861 年曾国藩设立安庆军械所，次年，李鸿章设立上海制造局。他们的思想是“治国之道，在于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60 年代，洋务派先后举办了江南制造局、南京金陵制造

局、福建马尾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等。随着军事工业的开展，洋务派发现军事工业无法单独存在，必须有基础工业与之配套。所以，70年代又办了一些民用工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兰州织呢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同时清政府设立了专办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的衙门，成立外语学校京师同文馆、上海同文馆以及广州同文馆。清政府还聘请了西方的军事顾问和教官，建立了完全由西方技术和西方方式操作的大规模的北洋舰队、福建水师。

但是，洋务运动仅仅停留在器物文明层次，即简单模仿西方的器物技能，以维护旧的王朝制度。试图以船坚炮利吓阻西方列强的侵略，没有深入到制度层面和文化层次，没有认识到西方船坚炮利背后所代表的制度和文化力量。这时还没有脱离“西学源于中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狭隘观念。因此衰落的文明、腐败的王朝支撑不了强大的水师。1884年中法战争和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法国军队和日本军队轻而易举地打败了清政府苦心经营的福建水师和北洋水师。这实则是制度上的失败，文化上的失败。师夷之长技的洋务运动并未达到“制夷”的目的，不仅败于西夷，也败于一贯以中国为学习榜样的东夷日本。因此，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彻底打败了以求师夷军事技能，以强盛国家的幻想，人们开始探讨比器物文明更为深层次的原因。

维新运动——由器物文明深入到制度文明。洋务运动虽然已知不变不足以救亡，但领导人在认知上停留在师夷之长技的器物文明层次上。而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不仅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也使中国的精萃分子认识深化了，深入到制度层面，认识到不仅应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更应学习西方的政教文明，尤其是他们意识到曾经弱小的日本之所以强大，得益于向西方英国学习，政体变革，实行君主立宪制。“西洋立国自有本末，不明此义，则万物无根本。即倾国考求西法，亦无裨益。”（郭嵩焘语）。因此，戊戌变法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是把洋务运动的“器物层次的现代

化”推进到“制度层次的现代化”。维新运动的领导人康有为五次上书光绪皇帝，要光绪皇帝仿效明治维新进行改革，终于被采纳。光绪皇帝决心做一个明治天皇式的人物，推行西方的君主立宪制。1898年光绪皇帝提拔了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在他们的建议下，皇帝连连颁布改革的诏令，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包括改革科举制度，建立由低到高的教育体制，派学生出国留学，鼓励发明创造，设立各种专利局，创办贸易杂志，成立商会，政府出资兴办铁路，开采矿山，精简官僚机构，扩大陆军和海军等等。这些措施如果付诸实践，将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巨大的影响。以西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并不是绝对地反对改革，只是改革必须有利于加强他们的统治地位，所以，在维新改革103天中，所有重大改革方案也都是经过西太后同意才签发的，只是改革的深入必然触及他们的利益，为维护自己的特权利益，对维新派进行反扑和绞杀，轻而易举地扼杀了维新运动，戊戌六君子被送上了断头台，企图做明治天皇式的光绪皇帝郁郁寡欢地度过余生。从文化意义上讲，戊戌变法乃是传统文化的自我调整和改革，它的失败表明传统文化自身不具备自我调整与改革的功能。一场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辛亥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未能实现。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失败昭示了不推翻封建专制无以富民强国，无以救亡图存。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向西方学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中国现代化第三个运动。辛亥革命最大的意义在于推翻了帝制，结束了二千余年的家族国家形态，而代之以民族国家形态，这是中国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极重要的里程碑。然而，辛亥革命仅仅赶跑了一个皇帝，并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引发的是军阀割据、军阀混战，中国人民陷入外侮内乱的更加痛苦深渊。辛亥革命试图彻底向西方学习，建立共和政体，然而，西方资产阶级政府却一致支持袁世凯的独裁政体，给孙中山及中国的优秀分子以沉重打击，使他们认识到单靠西方式的议会民

主解决不了中国的根本问题。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思想和行为模式依旧停留在古老的世界之中，他们仍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正如费正清评价：“当时我们美国人接触到的那个现代中国，是轻轻地覆盖在古老文明表面的一层虚饰，在这层虚饰底下，旧中国仍在半个大陆的农村里继续存在。……这个旧中国是同我们隔绝的”^① 因而，仅有少数上层精英分子思想之变不足以改变中国，不足以创造一个富民强国的中国，必须改变广大民众的思想观念。因而，新文化运动勃然兴起。

新文化运动——未竟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国文化层次的优秀分子从历次向西方学习变革的失败中认识到，要使中国真正强大起来，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必须改变大众的思想和行为。他们已深刻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主共和的矛盾抗拒之所在，主张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估值”，着重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批判旧礼教、旧思想、旧宗教、旧文学等，提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其代表人物有陈独秀、胡适等。他们办报纸杂志，写白话文，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贞节、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笑骂，就是断头留学，都不推辞。”的确，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缺乏民主自由的因素，也缺乏实证的自然科学作为其基础。陈独秀明确地将民主与科学提出来，作为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方向，是相当准确和深刻的。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尖锐的批判，积极主张学习西方文明。“我的愚见是这样的：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的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

^① 《美国与中国》第四版，第 176 页。

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的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辉光大。”

然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像 16 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那样，彻底清除封建专制文化的影响，为资产阶级革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奠定思想文化基础（如自由、平等、竞争、人权、开放、理性等思想，社会契约、政治民主、权力制衡、规则意识、法治思想等理论），为其提供了巨大的变革动力。相反新文化运动陷入“中体西用”、“全盘西化”、“西体中用”等无谓的争论之中，或只着重批判而少建树，未能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必不可少的宏大的理论基础和精神武器。

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兴起，资本主义制度确立，西方诸国迅速强盛，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因而，强大起来的资产阶级凭借廉价的商品和兵舰大炮，轰开了一个个古老的国门，“把一切甚至最野蛮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① 所以，“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② 然而，俄国通过一部《废除奴隶制法令》就走向了资本主义。日本通过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就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并强大起来，从而来欺侮曾经是它的老师、它的榜样中华帝国。古老文明的中国，虽经一次次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探索，向西方学习，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却均以失败而告终。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5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 页。